

美国总统大选与农业增产:试析小麦*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 Analysis of Wheat

徐海俊 高凌云

内容提要 美国总统大选与农业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大选将导致农产品增产。在既定需求下,作为农产品出口的全球性大国,美国产量的增加将显著影响全球农产品的价格。必须加快我国农产品供给结构改革,在确保粮食总量安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与两个市场减缓美国粮食产量的变动对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冲击。具体应从如下方面着手:改变农业现有价格支持方式,促进农产品价格形成的市场化;加快农地流转,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逐步推进农业保险覆盖面,保障农民利益。

关键词 美国总统大选 农业政策演进 中国与全球化

作者单位 江南大学商学院 江苏无锡 210041;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北京 100732

Xu Haijun Gao Lingyun

Abstract: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has certain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ther things equal, the U.S. election will result in the increas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Under the given demand, as a global power of agricultural exports, the production increase of the U.S. will significantly affect global pric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o we must accelerate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our country and take full advantage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ources and markets to slow down the shock on domestic markets, and ensuring the safety of grain. Specific measures are as follows. First, change the existing mode of price support and promote the price market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econdly, speed up the farmland circulation and improve the scale revenu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ventually, gradually promote agricultural insurance coverage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farmers.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gricultural policy evolution,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与贸易大国,一直以来都将农业支持放在其政策的核心位置。由于地广人稀,美国具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历史上就作为欧洲的主要粮食及初级原材料的供应地。与传统的生计农业不同,美国的农业一开始就是商业农业,即农业生产是为了销售,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因此,在美国,大多数农业政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保障粮食总量安全,而是为了维护农场主和农民的利益。

在美国社会形成的早期,农业产值在整个社会中占比较大,农场主具有较大的政治发言权,很多总统都有自己的农场。美国农业具有土地资源丰富、规模大、资本配备齐全、农业劳动生产率高等特点,在世界农业贸易中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尽管如此,美国历届政府依然注重对国

*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美国大选与农业增产——以小麦为例》。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城镇化背景下食品消费的演进路径研究”(批准号:71373284)。

内农业进行保护,WTO 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主要归结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农业政策上的坚持。美国对农业的保护一方面是维护国内农场主的利益,另一方面政治选票也是其重要考量。由此可以认为美国总统大选可能会与美国农业政策的变化存在一定的关联。

一、文献综述

国外研究美国总统大选与农业生产之间的文献相对较多,从现有文献上看对美国总统大选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对资本市场和对地缘政治的影响。Donald M. Freeman 在对 1964~1992 年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分析了 1992 年美国总统选举对亚洲地区产生的影响。他认为,美国自由的市场经济在 1933 年转向凯恩斯主义,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执政期间转向萨伊主义,即供给学派,在全球经历石油危机、前苏联解体等重大事件中,美国选举对亚洲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克林顿总统的当选可能会减少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力量,经济上美国出于保障国内就业水平将对亚洲低工资地区的贸易政策作出适度调整,由于美国对亚洲地区关注降低,亚洲地区内部不同力量的崛起将会对亚洲地区现有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1]Marquis William Childs 通过对美国共和党、民主党选举历史对比,结合候选人的个人特质,认为约翰逊的高票当选将会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发生变化,尤其对越南、中国的态度有可能会发生改变,美国对欠发达地区援助政策也会得到强化。^[2]

关于美国总统大选对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的文献较多,绝大部分研究的结论认为美国总统大选对股票市场有一定的影响。H. W. Weldon 在论述总统选举周期理论的意义基础上讨论了总统选举周期和股票市场周期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提及在美国,低税收和稳定的政策环境是经济繁荣的保障,强调在涉及更多的税收、支出和更多的工业监管状况下的选举周期理论的应用,并进一步认为选举周期影响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股市,而不是个别股票。^[3]

Srinivas Nippani & Augustine C. Arize 通过实证分析认为,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对美国股市产生滞后影响,在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股市表现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美国总统选举同样也对其产生滞后性影响,即美国总统大选事件对股市产生消极影响,研究揭示加拿大与墨西哥股市也与美国总统大选高度相关。^[4]F.C. Alvine & D.E. O'Neill 认为,1960 年以来,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即在选举之前,经济已经进入繁荣周期。通过对 1961~1978 年资本市场分析后发现,在总统选举的前两年,股票回报率平均为 21.7%,在选举的前一年为 15%,在选举结束后下降为 3.6%,在第二年则降为 -15.2%。很显然,在总统选举前两年的时间里,股票价格上涨的趋势非常明显。这一研究打破了一般文献的结论,认为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是随机的,因此是不可预测的,而四年一个周期的选举事件表明,除短期(日、周或月)的学术研究外,股票价格的变化不是随机的。^[5]Vincent et al. 的看法与其基本一致,认为战后美国历届总统选举都有经济周期的存在,经济繁荣在选举前达到高点,政客使用短期财政政策刺激个人可支配收入,降低失业率,以争取选民,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繁荣与衰退趋于同步,选举时间也趋于接近。政党理想、政纲、组织、策略和候选人气质也是赢得大选的主要因素。^[6]G. Evans, MPickup et al. 对总统大选周期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现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中对于以往经济的回顾和现实经济的理解之间的关系存在错误,实际上对现实经济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偏好,即个人对经济的看法受到政治选举的影响。^[7]

但也有少数文献认为,总统选举不会带来经济周期的波动。I.M. Wasserman 的研究认为,美国的总统选举会带来繁荣,促使就业水平和收入的提高,进而导致死亡率和自杀率的下降。他采用 1903~1977 年的多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发现,当失业率变化受控的情况下,美国总统选举和自杀、死亡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结果表明,总统选举并不会带来经济及失业率的这种

周期性变化。^[8]R.R. Keller & A.M. May 也持有类似的观点,通过对 1969~1972 年选举情况的分析认为,尼克松总统的个性和经营环境解释了其为什么操纵经济的政治利益。他用来改善 1972 年选举前的宏观经济条件的机制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工资价格控制,但这并不具有普遍意义。^[9]Alan et al.的研究发现民主党执政时宏观经济的表现一般好于共和党,原因并不是时间序列上观察到的更加扩张的经济政策,而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及人们对即将到来的新一届政府的良好预期。^[10]

国内文献更多集中在美国总统大选本身、政治议题、中美关系等方面。杨成绪认为,2016 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中国再次成为美国总统大选的议题,基于中美之间的现实关系,中美关系将经受严峻考验。^[11]徐以骅对 2012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研究表明,宗教影响美国总统大选政治的中、短期格局基本不变,共和、民主两党之间的宗教差距依然存在,宗教仍是决定美国选民政治倾向的因素之一。^[12]李岩分析了美国总统大选对美国和伊朗之间关系的影响,通过对各候选人的政治表态的分析后认为,如果共和党人上台,美国对伊政策趋向更加强硬的可能性较大。在大选的特殊背景下,共和党人的批评也可能促使美国采取更激进的措施。^[13]

从国外现有文献来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总统大选周期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部分涉及对美国国内外政策以及对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国内研究多集中在美国总统大选本身以及大选结果对我国政治和周边环境的影响,对美国总统大选周期对中国经济层面的影响研究较少。实际上,美国总统大选在现有的选举人制度下,执政党为获取选票必然会采取有利于自身的政策,通过取悦选民来获得政治上的延续,从而产生选举周期,这一点也被绝大多数国外文献认可。农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属于最根本的产业,对本国农业进行支持和保护是各国首选政策目标,越是发达的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也越大,研究美国总统大选如何影响农

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美国农业政策的变迁与阶段性特征

独立之前的北美地区作为殖民地一直以农业为主,欧洲通过殖民活动攫取大量的土地用来从事农业生产,源源不断地向欧洲提供食物和原材料。独立之后的美国早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为此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这些法令对促进美国农业发展以及优势农业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整个农业政策演变的过程上来看,美国的农业政策经历了大致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促增产

作为食物和原材料的供应地,美国早期的农业政策通过鼓励扩大土地耕作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两方面来提高农业产量,实现增产增收。1862 年,在美国总统林肯的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三个对美国农业和农业教育发展有着决定意义的立法,分别是《农业组织部法》《宅地法》《莫里尔赠地学院法》。《农业组织部法》规定了农业部的主要职责,给人民以合法的地权。《宅地法》规定,向那些在当地居住并耕种 5 年以上、年满 21 岁的个人或一家之主免费提供 160 英亩公有土地,这对美国农业中家庭农场制度的确立和巩固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促进了美国西部大量规模较大的农场的建立。《莫里尔赠地学院法》规定,从联邦公有土地中,按国会中各州众、参议员的席位,每席分配给 3 万英亩土地,由各州政府拍卖筹集资金,举办至少一所设有农业和机械课程的学院,即所谓“赠地学院”。

1884 年,在切斯特·艾伦·阿瑟担任总统期间,联邦政府颁布了关于阻止在牲畜中蔓延传染病的法令。1887 年,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在位期间,国会通过《哈奇法》,规定每个州或属地都要在农学院、综合大学或综合大学农学系领导下成立一个农业试验站,开创了由农业部、各州农学院和农业试验站分工协作共同承担农业科学研究试验制度。1905 年,西奥多·罗斯福政府颁布了阻止各州之间作物病虫害传播的法

令。1914年,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期间,国会通过《史密斯——利弗合作推广法》,由联邦政府资助各州,在州立学院领导下设立农业推广站,分别于1916年、1917年通过了《联邦农业贷款法》和《史密斯——休斯职业教育法》,前者降低农业贷款的利息率,使利息率均等化,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后者则为培养农业人才奠定了基础。

(二)第二阶段:稳生产、保收入

在这一阶段,美国农业政策大部分时间内都在削减产量,以维持农产品市场的稳定,为保证农民收入开始对农业进行保护,政府随后出台各种补贴等支持手段来维护农民的利益。这个阶段最明显的特征是政府开始直接干预农产品市场,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同时也扭曲了市场机制,导致农产品供给持续大于需求。

1933年的第一部农业调整法案反映了美国农业政策的转变。由于遭受大萧条的影响,欧洲粮食短缺,美国农民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导致粮食价格急剧下跌,供给严重过剩。为降低产量,维护农民的利益,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开始对食品和服饰业征税,并对降低产量农民进行补贴,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美国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耕地面积缩减。但是1936年该项法案的大多数条款被法院裁定违法,最终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作为过渡的《土壤保护和国内配额法》,新的规定下农民对土地的保护休耕可以获得政府补贴,在不违背宪法的前提下控制了农产品产量,削减了耕地面积。

1938年,罗斯福总统签署了新的《农业调整法》,该法在1936年《土壤保护和国内配额法》基础上通过向农场主提供无追索贷款建立起政府补贴与最低限价和农产品仓储的“常平仓”制度,将粮食供应安全、农场主收入与水土保持的三个目标有机地融入在这一制度中。该调整法还建立了农业保险制度,确保在极端天气的情况下保障农场主的利益。该法为稳定美国农业生产、解决农产品供给长期过剩的问题,建立起农业实验室,对农产品的产业链进行延伸,强化农业产品的深加工。

随着“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复苏,粮食需求开始逐步增长,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开始复苏,由于美国农业产品的竞争力使得美国开始考虑通过市场来决定农产品价格,实行灵活的价格支持,改革现有的农产品支持价格体系,这是1948年《农业法案》的核心政策。但这一政策遭到抵制,美国政府不得不在1949年对该法进行修订,强化大宗农产品的价格支持,进一步扩大支持范围,并将1949年法案升级为永久法案,即1949年的价格支持与补贴为最低水平,在未来新的调整若无法达成则会回到1949年的法案标准。

持续的价格支持与补贴使得美国农业供给再次出现过剩,1954年通过的《农产品贸易与发展法案》继续通过土地休耕制度来降低农产品过剩,鼓励美国政府向国外销售和捐赠美国食品,消除农产品供给侧过剩的问题,同时也改善美国对外形象,实现了人道主义目标。然而,这一政策也因为对外粮食援助附带的政治条件以及对受援助国农业生产的影响而备受争议。

1965年和1970年美国分别通过《食品和农业法案》和《农业法案》,这两次法案对农产品支持体系进行改进,调整了农业贷款的利率以及修改了相关的土地休耕条款,融入直接支付体系,确立直接支付的上限。这些调整使得农民获取的政府直接支付与农民种植品种的关联性减小,过剩的农产品通过食品券计划和免费午餐计划来缓解。1973年,美国通过《农业和消费者保护法案》。美国农业调整法案一直以来以消除过剩为目标,但是此次农业法案因全球供给的减少而实施增产的计划。随着石油价格的上升、美元贬值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农产品过剩以及价格下降的问题很快再次出现,农民不得不重新依赖政府支持。

1977年通过的《食物与农业法案》在农业政策方面并未作出根本性的调整,只是因为对前苏联的粮食禁运导致国内过剩而使国内支持水平进一步提高。1981年的法案中为未来的营养、环境和可持续农业利益集团参与到未来的农业调整法案提高了基础。1985年颁布的《农

业安全法案》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冻结价差补贴与补贴基础面积、鼓励和补贴土地休耕、扩大出口补贴来提升农产品价格水平和出口竞争力。休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业过剩的问题,营养、环保及可持续农业的理念正式在此次农业法案中得到体现,并设立了相关的农民收入支持。随后而来的农产品价格上升,促使1990年通过的《食品、农业、资源保护与贸易法案》开始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削减总体补贴水平,将农业补贴与农民的生产决策进行分离,维持固定目标价格等。

(三)第三阶段:提高效率、回归市场

长期对农业部门的价格补贴等支持政策不仅造成资源错配,也使得美国的财政难以持续。在这一阶段,美国开始逐步对支持政策体系进行修改,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支持政策尽可能不扭曲市场,一方面继续支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而增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对农业提供各种保险,建立价补分离的政策措施保障农民的收入稳定。

1990年的《食品、农业、资源保护与贸易法案》已经开始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而1996年通过的《联邦农业促进与改革法案》则是一个标志,该法对现有的农业补贴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废除临时供应控制,减少与市场价格和劳动生产率相关的差额补贴,暂停目标价格-价差补贴,实施生产弹性合同,推行运销援助贷款,实施补贴上限,推行长期资源保育计划。在此次农业调整法案中,政府开始减少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而更多尊重市场机制的结果,减少市场扭曲,在提升农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减轻了政府财政的压力,促进了农产品出口。

但是,2002年的《农业安全和农村投资法案》再度大幅度地提高农业补贴,在1996年农业法案的基础上新增反周期补贴,通过给予农民在农产品的目标价格与固定差额之间的补贴而稳定农民的收入。毫无疑问,美国此时增加农业补贴,包括其他发达国家对农业的巨额补贴是造成WTO多哈回合谈判失败的重要原因。2008年的《食品、保护和能源法》则延续了2002

年农业法案的思想,继续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支持,设立平均作物收入选择计划,无论是由于价格下降还是产量的下降导致的收入减少都将获得平均作物收入补贴,进一步保障农民收入稳定,设立新加入农户直接支付计划,在新加入农业的初始5年内可获得正常水平120%的直接支付水平以及50%的贷款率;设立生态保护项目,只要达到要求的农民即可获得110%的直接支付水平,除此之外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进一步提升农业基础设施。2012年的《农业改革、食品和就业法案》实施农业收入风险保障计划,扩大农作物保险覆盖面等一系列的农业支持和补贴计划。随着美国政府财政状况的恶化,以及美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2014年通过的《食物、农场及就业法案》改变了以往的高补贴支农思路,美国政府再次削减扭曲市场的产量和价格补贴,通过市场的方式而不是直接干预的方式来稳定农民的收入。新法案在取消直接支付的同时设立价格损失保障和农业风险保障,继续扩大和完善农业保险,利用市场的手段对农业进行支持。

综上所述,1933~2016年,美国共出台30余部农业调整法案,从最初因经济危机导致的农业危机开始,美国农业政策法案的建立与调整经历了鼓励生产、限制生产的往复,提高补贴到降低补贴再到降低补贴的循环,也有政府干预到尊重市场的反复,但最终的趋势是走向以市场为主导,尊重市场规律。纵观一百多年来美国农业政策的调整历程,其目的都是提高农民的收入、稳定农业生产,每一次农业法案的调整都是应对当时的农业发展面临美国总统大选而进行的。

三、美国总统大选影响农业的逻辑机理

在美国尽管有很多的政党,但历史上只有共和、民主两党轮流执政,一个为执政党,另一个党派就是最大的在野党。作为现任总统,通常会在选举年甚至中期选举时,适当采取扩张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降低失业率,从而使经济走向繁荣,为本人连任或政党继续执政

获取更多的选票，但结果物价水平也会随之上升。最终无论是哪个党派获得竞选胜利，面临人为刺激而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不得不采取紧缩的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这将会带来失业水平的上升，经济陷入衰退。随之而来的是下一个年度的总统选举，执政党又再度采取刺激政策，从而使宏观经济出现周而复始的与选举周期相应的波动，即米哈尔·卡莱斯基所称的政治经济周期。

上述政治经济周期反映在农业领域，其逻辑是：政府扩张的财政会使相关领域或行业政府财政支持水平增加，因此农业支持水平也会相应地增加，但表现形式可能不同，比如通过直接的价格补贴等补贴形式，也可能是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形式等。政府的货币政策同样也会对微观领域带来影响，比如扩张的货币政策会使利率水平下降，从而使投资成本节约，这同样也会惠及农业产业，促使农业扩张。毫无疑问，无论是补贴的增加或成本的节约还是基础设施的改进，都会使农民实际收入水平上升，激励农民增加产出，从而使总体产量水平增加。当扩张的政策不可持续时，政府开始紧缩财政支出和货币供应，结果是政府对农业支出水平下降，也许相比较其他行业农业支出削减可能有限，或者表现为农业支出增长水平的下降，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下降。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利率水平的上升，从而导致农业投资的成本上升。因此，当紧缩来临时，对农业而言表现为产出水平的下降，或者是农业产出增长率的下降。

从最近历届美国总统大选来看，尽管选举关心的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如中美关系、国内的教育医疗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关心选票的美国政治家们就忽视了农业，农场主在美国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博弈力量。表 1 显示了美国农业产值排名前十州的基本情况，包括主要农产品品种、人口以及选举人票数及所占比例。

由表 1 可见，美国农业排名前十的各州拥有的选举人数为 180 人，占总选举人数的 33.5%，可见这些州对总统候选人的重要性。在这些州中农业人口比例并不高，但具有较强的游说能力，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下，对美国总统大选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因此，执政党或竞选连任的候选人将会有足够的动力去动用政府财力获得这部分选民的青睐，在以耕种面积和产量为基础获得政府补贴和支持的前提下，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农产品产量增加。

当然，美国农业产量的周期性波动可能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既有宏观周期波动的带动，又有农产品特质所带来的蛛网理论所描述的波动，也可能与美国政治大选有一定的关系。在一个特定的宏观环境和自然条件下，美国农业波动的机制应该是自由市场农产品的蛛网波动和选举等外生冲击因素叠加而成。

尽管美国总统大选的主题并不关乎农业，农业问题也从来不是美国总统大选关注的议题，但美国总统换届对农业仍然存在一定影响。出于农业生产的长周期性和政策实施作用的滞后性，以及执政党政权的延续考虑，对农业的关

表 1 美国主要农业州选举人数及占比情况

州名	主要农产品	人口排名	选举人数	占比
加利福尼亚	牛奶、扁桃仁、葡萄、牛、草莓等	55	55	10.2%
艾奥瓦州	玉米、猪、大豆、牛和小牛及乳制品	7	7	1.3%
德克萨斯州	肉和牛、棉花、肉仔鸡(童子鸡)、温室和苗圃产品以及乳制品	34	34	6.3%
伊利诺斯州	谷物、大豆、牛和小牛、猪肉、乳制品	27	27	5.0%
内布拉斯加州	牛和小牛、谷物玉米、大豆、猪及小麦	5	5	0.9%
明尼苏达州	玉米、猪、大豆、乳制品以及牛和小牛	10	10	1.9%
堪萨斯州	牛和小牛、小麦、谷物玉米、大豆和猪	6	6	1.1%
北卡罗来纳州	猪、肉仔鸡、温室和苗圃产品、烟草及火鸡	15	15	2.8%
威斯康星州	乳制品、牛和小牛、谷物玉米、温室和苗圃产品以及大豆	10	10	1.9%
印第安纳州	玉米、大豆、猪、乳制品和鸡蛋	11	11	2.0%
合计	—	180	33.5%	—

注是先于大选进行的。但是,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政府的法案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农业,进一步地,美国财政支出也是各利益方博弈均衡的结果,因此,这些解释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的农业产量有待实证检验。

四、实证分析——以小麦为例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无法获得棉花、大豆以及玉米等主要农产品的价格、产量等长时间序列数据,因此这里通过对小麦的长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小麦实证数据均来源于美国农业部网站公开数据。

(一)小麦历史数据说明

从美国 USDA 政府网站上搜集了自 1886 年以来美国小麦产量及价格的数据。图一显示了美国 1862~2014 年的产量,从总体上来看,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美国小麦的产量呈持续增长趋势,此后,美国小麦的产量波动性开始变大,总体趋势呈下降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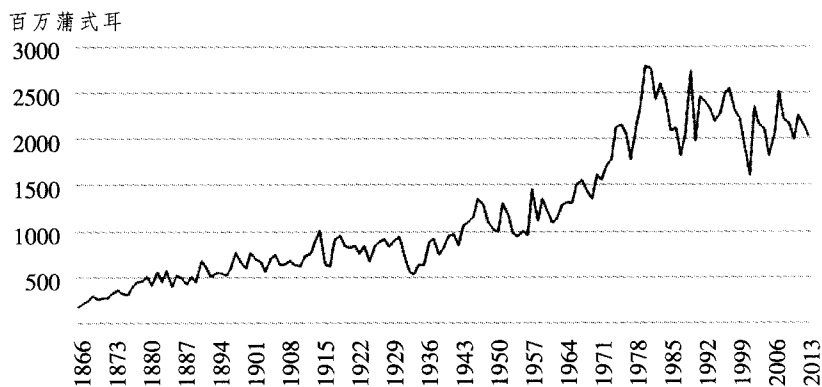
图二显示了美国小麦产量的年度增长率变化,从小麦的增长情况来看,美国小麦产量增长的波动较为剧烈,有些年份上升甚至达到 50%,也有少数年份下降水平达到 30% 左右。

除 1933 年、1977 年等少数年份增长幅度较大,其他年份波动幅度基本稳定在 $\pm 30\%$ 范围内。相比较产量的总体趋势来看,产量的增长率变化幅度较大。小麦的产量变化呈现出典型的周期性波动,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应

该反映了农产品的蛛网理论,即农产品特殊的属性使得本期的产量决定本期的价格,但本期的价格影响下一期产量水平的决定,导致农产品的产量呈现周期性的波动。但在个别年份中,小麦的波动幅度较大,可能是在原有内生周期波动的基础上的外生冲击因素叠加而成,比如说政府的政策因素、能源价格因素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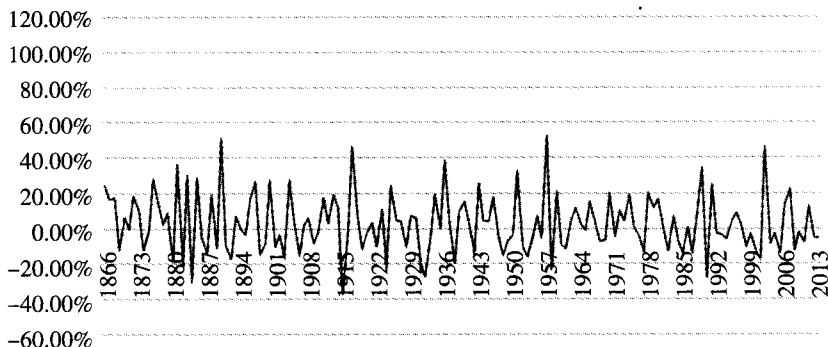
(二)实证结果与解释

影响农产品产量的因素较多,如价格、气候、土壤、人口等,美国总统大选也在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农产品的产量。但是,要从数量上得到美国总统大选对农产品产量的确切影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现阶段,无法获得美国土壤、气候和技术等诸多影响农产品产量的数据,且能获得完整价格数据的农产品品种只有小麦。因此,后续的实证工作在以小麦为基



图一 小麦产量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网站, http://www.usda.gov/wps/portal/usda/usdahome?navid=DATA_STATISTICS。



图二 美国小麦年度增长率变化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网站, http://www.usda.gov/wps/portal/usda/usdahome?navid=DATA_STATISTICS。

准的基础上,另作一些假设。

假设小麦产量是美国总统大选、价格和其他不可观测变量的函数,即:

$$\text{output}_{wt} = f(\text{elect}_{wt}, \text{price}_{wt-1}, X_t)$$

其中, output_{wt} 为被解释变量,是小麦在 t 期产量的对数值; elect_{wt} 为是否选举年的虚拟变量,如果是大选年,则其值为 1, 否则为 0; price_{wt-1} 表示滞后一期小麦的价格,加入该变量是为了检验小麦的“蛛网效应”,即是否存在上期价格正向影响当期小麦产量的情况; X_t 表示 t 年其他的众多不可观测变量。由于 X_t 不可观测,如果直接采用时期虚拟变量,可能会因自由度太大而无法估计,因此,这里采用加入时间多项式的方式加以解决。最后,考虑到技术、耕种面积、肥力等的延续性会使得农产品的产量具有较明显的延续性,在上述公式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来控制。

表 2(下页)提供了基本的估计结果。设定(1)利用所有年份,即 1866~2014 年的数据,结果显示大选虚拟变量对小麦产量确实具有正向影响,但在 10% 的置信水平下仍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不仅如此,调整的 R^2 为负和 F 统计量非常小,说明大选虚拟变量并不是影响小麦产量最核心的因素。设定(2)加入了小麦产量的滞后项,用以控制诸如技术、肥力等不可观测变量,结果显示大选虚拟变量对小麦仍然具有正向影响,但仍然不显著。不过加入滞后一阶的被解释变量后,方程的显著性和解释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当然,滞后阶数具体应该是多少,仍然需要作进一步的尝试。由于滞后三阶及以上均不显著,设定(3)提供了加入两阶滞后的结果,可以看出与设定(2)的结果基本类似。设定(4)加入了滞后一期的小麦价格,用以检验蛛网效应,结果表明上期小麦价格提高 1%,本期小麦产量会增加约 11.8%,即对小麦而言,确实存在上期价格正向影响小麦产量的蛛网效应。但是,上述四种设定中,大选虚拟变量始终不显著。

根据前文所述,1933~1945 年美国施行罗斯福新政,其中,1933 年颁布了第一部《农业调整法》,自此之后美国农产品产量大幅增长,以

致出现生产过剩的情况,显示政治对农产品产量的影响开始逐步显现。1933 年之前^①,小麦的产量变化并不明显,变动幅度也较小;1933 年以后,小麦增产的趋势较为明显,而且波动幅度更大(见图三,下页)。由此得出,早期美国总统大选对农产品产量的影响可能并不如现今这么重要。为此,设定(5)将估计的样本年度限定在 1938 年以后,结果表明,大选虚拟变量对小麦产量的影响有明显增加,大选年相比非大选年,产量大致会高 6.4%,且至少在 5%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而其他变量的影响基本如前。设定(6)和设定(7)尝试着加入时间多项式,进一步控制不可观测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大选虚拟变量对小麦产出的影响始终保持稳健。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尽管从表面上看,美国总统大选议题基本与农业无关,但是通过分析美国总统大选机制,从动机上看,执政党存在一定的政策操纵空间,利用执政地位通过取悦农民获得其选票从而实现执政党的政治意图。因此,美国总统大选对农业的影响存在合理的逻辑解释。这一假说在以小麦为例的实证分析中得到验证,在大选年,剔除其他因素后,美国小麦的产量因为大选这一事实而增加 6%。这一实证结果表明美国总统大选与农业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大选将导致农产品增产。在既定需求下,作为农产品出口的全球性大国,美国产量的增加将显著影响全球农产品的价格,美国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从而对中国的农产品市场产生较大的压力。

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应对这一压力的重要措施。我国的农业发展存在结构性矛盾,在农业产量连续增加的同时粮食进口量也连年增加。美国是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农产品出口国,大选年农产品产量增加,价格相应下降,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差进一步拉大,带来较大的进口压力。因此必须加快国内农产品供给侧

^①另外,我们还采用了 1939 年、1941 年、1943 年、1945 年等年份作为分界点,但结果基本没有变化。

表 2 美国总统大选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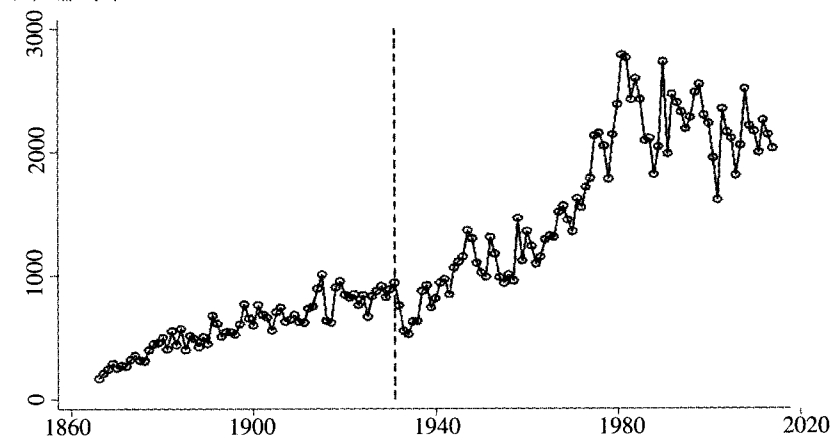
	(1)	(2)	(3)	(4)	(5)	(6)	(7)
_Ielect_1	0.0366 (0.30)	0.0186 (0.61)	0.0106 (0.37)	0.0127 (0.51)	0.0640** (2.25)	0.0614** (2.08)	0.0649** (2.16)
L.output_w	—	0.950*** (54.55)	0.682*** (8.39)	0.606*** (7.82)	0.594*** (4.87)	0.481*** (3.39)	0.540*** (4.63)
L2.output_w	—	—	0.274*** (3.47)	0.255*** (3.50)	0.188* (1.84)	0.0985 (0.87)	—
L.price_w	—	—	—	0.118*** (4.68)	0.123*** (3.14)	0.128*** (2.80)	0.128*** (2.85)
year	—	—	—	—	—	0.469*** (2.92)	0.502*** (3.20)
year ²	—	—	—	—	—	-0.0001*** (-2.92)	-0.0001*** (-3.20)
_cons	6.874*** (110.36)	0.356** (2.89)	0.318** (2.60)	0.926*** (5.52)	1.498*** (3.33)	-463.4*** (-2.92)	-496.0*** (-3.20)
N	149	148	147	147	76	76	76
ll_0	-147	-143	-140	-140	-29	-29	-29
F	0.09	1496.27	1027.85	833.32	140.93	83.65	102.32
R ² _a	-0.0062	0.9401	0.9423	0.9491	0.8734	0.8847	0.8850

Note: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1, ** p < 0.05, *** p < 0.01。

结构性的改革,在确保粮食总量安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与两个市场减缓美国粮食产量的变动对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冲击。

第一,改变农业现有价格支持方式,促进农产品价格形成的市场化。我国的农业支持政策主要以各种补贴为主,尤其对大宗粮食产品采用直接的价格支持方式,这一政策刺激粮食产量增长,保障了国内粮食安全,但是长期的价格支持扭曲了农产品市场机制,推高了国内的农产品价格,使得国内粮食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严重倒挂,倒逼进口的增加。为此,应转变现有的价格支持方式,一方面尊重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保障农民利益的前提下降低粮食的国内外价差,这不仅可以促进国内粮食库存的削减,也可以降低整个

百万蒲式耳



图三 1933年前后美国小麦的产量

社会的劳动力成本。

第二,加快农地流转,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土地细碎化、单个农户规模小也是限制国内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过低的规模导致我国的农业只能以精耕细作的劳动力密集型模式经营,在某种程度上我国农业仍然呈现生计农业的特征,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适当的土地流转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可

以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转移,缓解城市劳动力不足的危机。规模的扩大,使得大农业的技术和大农机可以得到推广和应用,这将极大地促进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改变农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地位。

第三,逐步推进农业保险覆盖面,保障农民利益。无论是价格支持方式的改革还是土地流转都不可避免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美国最近的农业法案调整思路是改变传统的价格补贴方式对农业进行支持,转而向农业提供更多的保障,在风险共担的原则下对农场主的收入进行保障。尽管美国农业发展远高于我国,但这一思路仍值得借鉴。持续的政府财政资金托底收购的价格支持短期内稳定了农民收入,从长期看这一政策造成的扭曲效应只是不断地将农业危机累积并掩盖,而且效率较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发展所遇到的困境。通过向农民提供更多的农业生产保险,通过杠杆方式利用财政资金,建立政府与农户风险共担的机制来应对市场和自然条件的变化,有助于调整农业生产的结构和激发农户的积极性,更好地应对美国的农产品带来的冲击。同时还应给予农民必要的生活保障,上述改革的推进必然导致传统生计型的小农经济解体,取而代之的规模型商业农业将导致现有农业劳动力出现分化,一部分年轻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部门,而中老年的农村劳动力无法转移到城市,对这部分人群的保障将有利于农村改革的顺利推行。**Reform**

参考文献

- [1]Donald, M. Freeman.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992 and Its Impact on Asia.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3, 1 (2): pp.144~176.
- [2]Marquis William Childs. Impact of the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on Foreign policy. *Pakistan Horizon*, 1965, 18(1): pp. 38~44.
- [3]Weldon, H. W..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ory Cycle. *Business & Economic Review*, 2008, 54 (2): pp. 19~38.
- [4]Srinivas Nippani and Augustine C. Ariz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mpact on Canadian and Mexican Stock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ume 29 Number 20 Summer 2005: pp. 271~279.
- [5]F.C. Allvine, D.E. O'Neill. Stock Market Returns and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Cycle: Implications for Market Efficiency.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1980, 36(5): pp.49~56.
- [6]Vincent Wei -cheng Wang.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Economic Cycles. *America Monthly* 27 (July 1988): pp. 4~12.
- [7]Evans, G., Pickup, M.. Reversing the Causal Arrow, The Political Conditioning of Economic Perceptions in the 2000 - 2004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Cycle. *Journal of Politics*, 2010, 72 (4): pp.1236~1251.
- [8]I.M. Wasserman.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Suicide and Mortality Patter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9, 48(5): pp.711~720.
- [9]R.R. Keller, A.M. May. The Presidential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of 1972.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84, 44(2): pp. 265~271.
- [10]Alan, S., Blinder Mark, Watson, W.. Presidents and the US Economy, An Econometric Explo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 (4): pp.1015~1045.
- [11]杨成绪:《对 2016 年美国大选年中美关系的若干思考》,《国际观察》2016 年第 1 期,第 24~33 页
- [12]李岩:《从美国大选看其对伊朗政策走势》,《世界知识》2012 年第 5 期,第 32~33 页
- [13]徐以骅:《宗教与 2012 年美国大选及当前中美关系》,《世界宗教研究》2013 年第 6 期,第 21~30 页

(责任编辑:白 静)